

移风易俗与象征替代：明清宁化显应庙的祭礼之争

魏德毓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宁化建立的显应庙，原是宁化民间举行祭拜草仓神的重要活动场所，南宋时期纳入官方祀典。明代国家对民间信仰活动实行严格控制，官方希望通过以李纲为主神来重新确立显应庙神灵体系，但这种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神明未能与地方社会建立直接联系，最终未能实现“民间化”和“在地化”。

关键词：明清时期；民间信仰；移风易俗；象征替代；宁化显应庙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6)01-0140-05

中国民间的传统神祇极多，不同的地域社会所崇拜的地方神祇也不同。民间社会在持久崇拜本地方神祇过程中，形成了地方的神明信仰传统。明初，国家加强了对民间宗教的控制，地方神崇拜往往被纳入“淫祀”，受到毁弃。在此历史背景下，宁化官方试图通过以李纲为主神代替宁化地方原有的草仓神象征体系，实现移风易俗的目的，但是这种新的象征体系没有获得宁化地方社会的认同。本文主要考察明清宁化官方实行移风易俗与象征替代的历史过程，并探讨这一祭礼改革失败的原因。

一、宁化显应庙的由来与民间信仰形态

宁化显应庙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最早称为长孙将军祠，其神明在地方社会称为草仓神。南宋初年李纲经过宁化，曾去祭拜过草仓神。现存最早有关宁化显应庙的记载，见之于南宋开庆年间修纂的《临汀志》：

在宁化县西，地名草仓，长孙将军祠也。将军讳山，闽时锐将，护乌挽至县而没，称草仓将军。后出灵显，自是阖县敬信，有求必应。宋朝天圣间，永福、进贤二坊人争土牛，讼于漕台。檄分为二庙，一曰通圣，一曰崇兴。旧传崇兴祠前乃东京孔道，南渡初丞相李公纲经过，有诗云：“不愁芒屨长南谪，满愿灵旗助北征。酌彻一杯揩眼泪，烟云何处是三京？”嘉定间，赐庙额曰“显应”。绍定初产瑞芝，郡守林公_有诗记其事^[1]。

这段文字记载告诉我们显应庙的建立是在闽国锐将

长孙山死后，由于灵异获得宁化地方社会认同，才建庙祭祀。北宋时，当地永福、进贤二坊的民众因为迎春时争执土牛，才分为通圣和崇兴两庙。两坊民众争夺土牛，说明显应庙不仅是民间崇拜的神灵，而且已经转变成成为地方保护神。李纲经过宁化，在草仓祠休息，有感而发写下了表达忠君忧国思想的诗句。从南宋嘉定年间赐庙额为“显应”，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册封是由于草仓神灵验。宋代对地方神祠的册封有明确的规定：“自今诸神祠无爵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2]在《宋会要辑稿》中，详细记载了显应庙在宋代的三次册封，“一在宁化县，神威济显应侯。嘉定五年十二月，加封威济显应孚助侯。十二年九月，赐额‘威济显应孚助宣灵侯’。”由此可见宋王朝对显应庙的册封逐渐在升级。宋王朝通过对地方神祇的册封，使地方神庙成为国家的“教化”和“德化”的象征。

明代有关显应庙的记载大多沿袭《临汀志》的说法。明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载：“显应庙在县西草仓。神姓长孙，名山，伪闽锐将也。护乌至县而歿，县人祀之，凡雨_有疫疠，祷之辄应。宋嘉_有间赐额。国朝洪武间重修。按旧志云，神姓长孙，新志云姓孙，恐误。”^[3]崇祯年间的《闽书》载：“显应庙，在县西草仓。神姓长孙，名山，伪闽锐将也。护乌至县而歿，县人祀之，雨_有疫疠，有祷辄应。宋嘉_有赐额。”^[4]明嘉靖年间

收稿日期：2005-03-22

作者简介：魏德毓（1976-），男，福建连城人，厦门大学历史系2003级博士研究生。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一山川祠，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75页。注：《宋会要辑稿》中，该庙不称显应庙，而称灵感庙，但是从神的封号判断应当是草仓神并且疑有缺字，三次册封中第一次没有记载时间。

的《汀州府志》则载：“显应庙，在县南西三里，地名草仓。将军姓长孙，讳山，称草仓将军，每出灵，民庙祀之。后因民争，分为二庙，一曰通圣，一曰崇兴。”^[5]从这些记载表明，宁化地方社会发生水灾、旱灾、瘟疫或疫病的时候，民众曾向草仓神祈祷，而且可能是相当的灵验。这些神祇的灵验与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使草仓神在宁化百姓中树立了灵威，深入到宁化民间社会之中，具有地方保护神的色彩。在这些记载中没有明确说明显应庙的性质是民间庙宇还是官方庙宇。但是从“县人祀之”和“民庙祀之”推断，应当属于民间庙宇。

同时，民间中也有许多有关草仓神的传说。如城西显应庙创立的传说：

草仓庙祀晋长孙将军，城西有庙亦祀之。闻初筑城时，近西门溪水冲突，啮之基不能立石，匠无如何。有老人褰裳助之，遂固。众疑佻术中无此人，阴尾之出城，至草仓庙不见，入视神像，即助者也，其裳犹湿。惊异相传，遂于筑处立庙^[6]。

从这一传说中，我们看到原先两坊居民争夺土牛而分立二庙的历史已经淡化，转变成城西显应庙的建立是草仓神显灵帮助工匠筑城的结果。草仓神帮助修筑城墙，所维护的正是宁化地方百姓的利益，草仓神的地方保护神特色更加明显。

由于建国以来的破除迷信运动和近年来的公路建设，宁化最早的两座显应庙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民间仍然存在有关草仓神的传说：

南宋抗金名将李纲，曾经数次路过宁化。传说头一次是从邵武老家赴京时路过宁化的，在宁化县城西的草苍庙住一宿。该庙祀草苍尊王神像。草苍尊王为长孙将军名山，昔闽王（审知）骁将，因护刍挽来宁而歿，邑人立庙祀之。李纲在庙中睡至半夜，忽梦草苍神取其眼睛嵌于木柱之上，醒来后不解其意，回至京城不久即被拜为相。回想在宁化县城西草苍庙梦中之事，方恍然大悟，“目”、“木”乃相字，故传草苍神授梦显灵。此后，该庙不断有人夜宿庙中以求神托梦^[7]。

这说明通过灵验故事使草仓神崇拜深入到民间，在宁化地方社会中逐渐建构了一个以地方神认同为中心的民间信仰体系。

二、明代地方官的“毁淫祀”与“象征替代”

明王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对民间祠庙重新进行了界定，规定：“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8]洪武三年对禁淫祠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

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僭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于是中书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祀灶、乡村春秋祈土谷之神，凡省灾患，祷于祖先，若乡属邑属郡属之祭，则里社郡县自举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青词。亦不准塑画天神地祇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覡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9]。

明代国家为了加强对民间宗教的控制，把各种不符合官府祭礼要求的祭祀活动都列入“淫祀”，但官方的禁令显然无法阻止民间的祭祀活动，所以才有一系列的毁淫祠行动。明代福建先后有几次规模较大的清除淫祠的活动。明前期，欧阳铎任延平知府时曾毁淫祠数十百所^[10]；明代中期，马性鲁任顺昌知县时极力尽废淫祠，柴镡任永春知县时“毁淫祠为社学”^[11]；明末叶春及任惠安知县时大力禁绝淫祠，“立里社如故”^[12]。明前期的宁化是否有毁淫祠的举动，目前尚未见到明确记载的史料。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清除淫祠活动的高潮时期，宁化也曾发生过毁淫祠的事件。明末宁化著名学者李世熊与伍象新信中，谈到著名连山庙四迁其址之事时，曾经提及宁化官方的毁淫祠举动：“嘉靖间查毁天下废寺淫祠，亦正经事，碑文谓之厄运，可乎？”^[13]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次毁淫祠的规模有多大，但是显应庙显然受到波及，故有“后将军混入淫祠”^[14]之说。不过由于李纲经过宁化时，曾经拜过显应庙，所以当时没有作为淫祠毁弃，得以存留下来，“赖公（李纲）诗毋毁，则藉以光大者多矣”^[14]。

从史料中，我们也看到显应庙在洪武初年曾经维修过，这恰恰符合明太祖颁布的另外一条诏令：

（洪武）二年，又诏令天下神祇，尝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8]

诏令中所规定以往这些已经存在的庙宇，虽然不允许百姓祭拜，但是可以作为文物古迹加以保护，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洪武间重修一事。

显应庙虽然没有被毁，民间仍然祭拜它，但这显然不符合明代的宗教政策。对于这一问题，宁化官府没有采取以往毁淫祠的做法，而是将李纲作为显应庙的主神，同时将显应庙的庙名改为大忠祠。因为李纲是宋元以来士人所认同的忠义典范，显然符合官方教化地方象征的要求。在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宁化县志》中，仍然可以看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

嘉靖间，知县潘时宜移草仓神于后堂，特祀丞相于中堂，改祠额曰“大忠”。拨民廩

五间,官塘四口,岁收租银,以办二祭

……^[14]

同书中的《名宦志》,直接记述了潘时宜希望通过重新确立神明体系,来体现国家提倡忠义,教化地方社会,实现移风易俗的功绩:

潘时宜,永丰人。嘉靖二十二年,由举人令宁。修县治,建义塾,创书院以萃士,设学田以饬士,改大忠祠,祀李忠定以风士,其用意阔远,固去俗吏霄壤也^[15]。

同时,在同书中记载了明代提学副使熊汲的《显应庙记略》并对潘时宜的做法大加赞赏:

李公祠,盖为宋丞相李忠定公建也。前此未之有,始于今日,其顺民之情乎?读写怀诗,公自叙详矣。诗仅二十八字,而讨贼复仇,忠君忧国,恫乎有余思焉。至今传诵人口,虽三尺之童能扬言之,则夫过化之泽,千载一日,庙而祀之,固邑之人争先而奔走者也。予惟公忠义之性,与元气周流,常充塞乎天地间,而几先之哲,与敏达之材,果断之气,又足以副所欲为;且器使善任,豪杰尤附之。天不祚宋,困于馋邪,使颠沛流离而濒死者屡,可悲矣!朱子谓:“忠定入来,方整顿得成朝廷。”史臣论云:“以公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止为偏安?”斯论信矣!今神祠一憩,词气慷慨,且忘迁谪愁苦,北征之心,直与雷霆震而风飙驰,生气犹凛凛也。或谓公激烈忠勇,与诸葛武侯相似。侯吞并吴、魏之心,百折不渝,而征剿孟获,徘徊瞻拜伏波庙,词义感愤,得无与兹类乎?草仓为伪闽锐将,以死勤事,端拜酹奠,冀佑于灵,其有感于将军不浅矣。将军在闽为将,视丞相固当北面,惟以义气相感,钦仰威神,酹酒赋诗。后将军混入淫祠,赖公诗毋毁,则藉以光大者多矣。今以将军神奠后,而公位中堂,神安其居,民仰其德,忠义遗风,千载辉映,其于世教岂小补哉?当时卖国之奸,嗡嗡訾訾,乃欲以公缚送金人,又议不赦公以谢金,真罪通于天矣!然而宋室兴亡之机,能不于兹三叹云!予校文至邑,邑令潘时宜次第其事以请,于庙仍旧无增置,于祭即倚庐僦民居取足,皆经略得宜,可谓能识其大者矣。故记之^[14]。

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建庙的目的是以李纲的忠义来教化地方社会,以实现移风易俗和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目的。

明代官府也在大忠祠举行祭祀仪式,主要是春秋二祭,其资金来源是民廛和官塘租金。在明代崇祯年间编

修的《宁化县志》中,保留了官方举行祭祀活动时的祭文:

惟公义重君臣,气吞胡羯;灵旗北征,威声震烈。庙门宏开,忠孝昭揭,永正民心纲常。表则兹当仲春、秋,谨以牲醴用伸,常祭尚飨^[16]。

这些活动表明,这时的显应庙的性质已经由民祀转为官祀,具有官庙的性质。

宁化知县采取不同于其他地方禁毁淫祀的做法,以李纲为主神,重新确立显应庙的神明体系,将神庙纳入符合国家祀典的信仰体系之中,并且希望通过李纲的忠义精神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所注重的是“神道设教”。此时,以新的庙貌出现的大忠祠,已经由民间祭祀地方神明的庙宇,转变成具有官方教化目的庙宇。在地方官府的心目中,大忠祠已经成为官方教化地方的象征。

三、清代宁化民众、士绅与地方官对显应庙的不同态度

自明嘉靖以后,虽然地方政府将大忠祠的神明体系重新塑造,确立李纲的主神地位,使大忠祠成为官方教化地方的象征,但是民间百姓显然没有赞同官方的做法。他们依然从自己长久形成的崇拜传统出发,到大忠祠去祭拜,但是他们主要目的是到后堂去祭拜草仓神,所以草仓神依然有旺盛的香火。明代后期地方儒生看到后堂草仓神的香火旺盛,李纲神像前却冷冷清清,于是将李纲神像移到后堂草仓神的西边,和草仓神一起享受民间的香火。据康熙《宁化县志》记载:

明季乙酉(万历十三年)间,邑生以市佣祈祷,率向后堂长孙,而中堂寂寞,遂移丞相并列长孙之西偏。

宁化儒生的做法,显然是为了顺应民间的信仰习俗和仪式传统,使大忠祠和显应庙可以有机结合,促成李纲崇拜的“民间化”和“在地化”。然而,由于这一做法使李纲变成了草仓神的配神,违背了官府忠义教化地方的意愿,因而引起官府的不满和愤怒。明代提学副使熊汲在记略中宣称:

不知潘令君标祠曰“大忠”,为万世立教,不为市佣祈祷计,不以一香一烛为敬也。且长孙之香火,固丞相所遗留者,今反令丞相向长孙乞壁光耶?然则荒陂缥缈,亲饮食之鬼,皆得驾丞相之上耶^[14]?

官府希望通过李纲来实现移风易俗的目的,当地士绅未必不理解,但他们可能更注重维护地方神崇拜仪式传统,因而士绅也没有对官方的“象征替代”作出积极响应。熊汲最为不满的是,作为地方师表的宁化县教谕的记中也没有理解官府的良好用心,反而讥笑李纲向草仓神乞求香火。虽然笔者无法看到原文,但从明代提学副使熊汲的记略中,可以看出一些梗概:

郑教谕名为多士之师,眯目作记,反以

陈璠诮丞相。盖良心昏灭，不解灵旗北向为何指，亦不解忠定为何等人，此忠义沦亡之兆，先发于学士之口，类有鬼物凭之者，君子所为哀伤也。有识之士，当急正之，无失潘令公初旨可耳^[14]。

这里的郑教谕是一个了解明代宁化地方社会的官吏，而熊汲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官吏，据康熙年间编修的《连城志》对是熊汲这样记载：

江西南昌人，嘉靖甲辰以宪副充学使。

日与诸生讲学，听着耸然。操履严正，不可干以私，至诲人则恺悌可亲^[17]。

清代后期，官府再次对显应庙实行祭礼改革，试图通过行政手段确立李纲主神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同，据民国《宁化县志》记载：

嘉庆间，郡守薛凝度复正公位。久之，

民之易位者如故。郡守刘国光、邑令姚嘉植

乃于堂前创新祠专祀公，存古先之议以正祀

典^[6]。

李纲与草仓神的反复易位和大忠祠与显应庙的再次分离，表明李纲崇拜始终没有融入民间信仰体系，完成“民间化”与“地方化”。

可见，地方社会中普通的百姓没有理解官府提倡忠义的举动。而地方士绅虽然体会到官府这一举动所含的政治意义。但是，他们试图调适民间草仓神与国家李纲神崇拜之间的矛盾的努力，没有被官府所理解，反而受到保守官吏的指责。这使得士绅作为官府联结民间社会的桥梁作用无从发挥，无法创造李纲与地方社会利益相连的灵验传说，形成地方社会对李纲神的共同认同。从大忠祠李纲主神位置的更替，我们也看到官方也没有对显应庙持之以恒地举行祭祀活动，就使李纲崇拜难以深入民间社会，实现“民间化”与“地方化”。

四、余论：象征体系的“民间化”与“在地化”

陈声寿对潮州地区双忠公信仰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国家祀典中的神明——张巡、许远，在地方士绅的推动下在潮州地区逐渐普及，并且创造出与本地社会生活有关的新的灵验传说，直接促进了双忠公信仰在潮州的“地方化”，获得了民间社会的认同^[18]。黄挺的《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与乡土观念——以潮汕双忠公崇拜为例》一文考察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双忠公信仰活动中乡民、官师和士绅的不同态度，乡民注重神灵的灵验，官师注重“神道设教”，士绅则在调适二者之间的矛盾，

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士绅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19]。这是国家象征“地方化”中成功的例子。

明清时期的宁化官府对民间庙宇采取象征替代的政策，希望通过国家政权力改造地方祠庙的神明体系，使地方祠庙体现国家的德化和教化意义，成为国家教化地方百姓的象征。这是国家脱离地方社会的一厢情愿，所提倡的忠义也只是一个虚浮在民间社会民众之上的概念，无法形成民间社会的普遍认同。其所塑造神明体系的教化意义，也没有像潮汕地区的士绅一样，通过与民间的灵验传说故事来融入地方社会，完成国家象征的“民间化”与“在地化”。因而大忠祠无法被民间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更难以融入民间社会。官方的祭祀活动更多的主要是宣传教化的政治意义，但是官府对大忠祠的祭祀活动没有长久的持续存在。明中叶以后，国家对民间宗教活动的控制明显减弱，官员对国家性神灵的祭拜热情也明显减退。对大忠祠李纲神的崇拜也没有持之以恒，地位难以持久存在，最终并没有获得民间社会的认同。民间社会自己所创立的神明，有民间神明灵验传说为其支撑，这些使神明信仰深深融入民间社会。民间在显应庙的祭祀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神灵的庇护，所赋予民间神祇是地方保护神的色彩。国家和民间在神明祭祀仪式的目的存在明显的对立。

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表，他们是联结官府与地方社会的纽带。官府通过他们将国家的意志下达到地方社会，形成地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明清时期宁化士绅理解到官府通过大忠祠表达出的国家教化意义，但是他们是在乡土社会成长起来，从小参与各种民间活动，承受本土文化的熏陶，熟悉本地方的民间宗教观念、礼俗制度的知识。所以他们在李纲神崇拜和草仓神崇拜的关系上，通过在草仓神的系统中加入李纲神，将国家象征与民间神祇相结合，实现李纲神的“民间化”与“地方化”。他们的做法，受到了以熊汲为代表的官方的强烈批评，并且官方也通过行政手段反复强调李纲神的国家象征意义。这使得士绅对李纲神的“民间化”与“地方化”的努力一直无法实现。

官府与士绅、民间社会认识理念上的误差，使得明代宁化官府采取改造民间祠庙的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建立的神明体系也没有获得民间社会的认同。由于没有最终实现李纲崇拜的“民间化”与“在地化”，明清时期官方在宁化移风易俗和象征替代最终没能实现。

[参 考 文 献]

[1] [宋] 胡太初，赵与沐。临汀志（卷四祠庙）[M]。福建师范大学据四库全书辑抄本。

[2] 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3] [明]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五十九，祠庙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96。

[4] [明] 何乔远。闽书，卷之一百四十七，灵祀志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396。

- [5] [明] 邵友道. 汀州府志, 卷九祠祀志 [M]. 天一阁影印本.
- [6] [民国] 黎彩彰, 黎景曾, 黄宗宪. 宁化县志, 卷十二祠祀志 [M]. 1917 年创修, 1925 年铅印本.
- [7] 刘善群. 宁化掌故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 [8] 明史, 志第二十六, 礼四诸神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307.
- [9] 明太祖实录, 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 禁淫祠 [M].
- [10] 明史, 卷二零三, 欧阳铎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版.
- [11] [民国] 郑翹松. 永春县志 [M]. 1930 年铅印本. 中国方志丛书, 华南方志丛书第 231 号. 台北: 文海出版社.
- [12] [明] 叶春及. 惠安政, 书里社篇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434.
- [13] [清] 李世熊. 寒支初集, 卷七, 答伍象新书 [M]. 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
- [14] [清] 李世熊. 宁化县志, 卷七, 坛壝祠庙志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 [15] [清] 李世熊. 宁化县志, 卷三, 名宦志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 [16] [明] 张士俊, 阴维标. 宁化县志, 卷之七礼志 [M]. 崇祯八年刊本,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 [17] [清] 杜士晋. 连城县志, 卷五, 官师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 [18] 陈春声. 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 [A]. 郑振满, 陈春声.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C].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 [19] 黄挺. 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与乡土观念——以潮汕双忠公崇拜为例 [A]. 郑振满, 陈春声.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C].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林日杖)

The Reforming of Custom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Symbol : Controversies upon Ceremonies of the Xianying Temple of Ninghu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WEI De-yu

(History Department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 Established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 the Xianying Temple of Ninghua was originally an important site where local residents worshipped the local deity Caocang , who was listed in the Ledger of Sacrifice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During the Ming , when the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over popular belief , local officials intended to re-order gods worshipped in the Xianying Temple by establishing Li Gang as the major deity. This program did not meet with success because the latter had trouble to make direct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nection to local society and was therefore impossible to be folklorized and localized.

Key words : Ming and Qing periods ; Popular belief ; reforming of customs ; replacement of symbol ; Xianying Temple of Ninghua